

东江纵队：从孤悬敌后到亮出红旗

1945年4月，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里的华南抗日纵队包括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则是其中最强的主力部队之一，华南抗日纵队除琼崖纵队外，多由东江纵队派干部组建或加强领导。值得注意的是，其前身东江游击队早在1938年就已经建立，却始终以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示人。直到1943年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根据形势的变化，向党中央建议东江游击队“亮出红旗”，才改编为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改编是党中央与广东省临委协同领导华南抗战的一大创举。

欧阳湘 朱华强

孤悬敌后，长期未亮红旗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惠阳大亚湾，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仅10多天时间，广州及其东江下游地区大片国土沦陷。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成立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之后，在东江下游惠阳、东莞、宝安等地成立了多支游击队（通称东江游击队），并历经几次整编。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东江游击队进至香港九龙地区坚持抗日，成功组织“秘密大营救”，与盟军展开合作，蜚声华南，享誉海内外。但因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力量弱小而且分散，东江游击队不是以党领导下的军队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

对于东江游击队来说，不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可以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避免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摩擦”的借口；有弊的一面是不便于加强领导。东江军事委员会书记梁

审时度势，公开红色面目

1943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广东省委）成立，直接受中共中央及其南方局领导，尹林平任书记，委员有连贯、梁广，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合署办公。广东省委注意到，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东江游击队公开接受党的领导的条件逐步趋向成熟。国际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好转，法西斯联盟开始瓦解。国内方面，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摆脱严重困难局面，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1943年7月10日，尹林平致电周恩来，提出东江游击队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认为“面目公开对实际活动无碍”。

广东省委的建议获党中央采纳。1943年8月23日，新华社发表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第一次宣布广九路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广九路及海南岛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了敌军一部分；同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说，华南伪军六万人，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

铸就华南砥柱

东江纵队成立后，始终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重要任务，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对华南抗战作出指示。8月，广东省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和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研究部署工作，决定对东江纵队进行整编，设置支队建制，共有7个支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在党的领导下，东江纵队加强武装建设，扩编部队，提高军队战斗力，深入敌后，转战各地，英勇打击敌人。广东省委又组建了珠江纵队，梁鸿钧赴粤中领导组建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东江游击队原参谋长李振亚担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东江纵队还派出得力干部参与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对此，广东省委宣称：“我们广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和琼崖独立纵队，已训练成为了解放广东人民鲜明的革命旗帜，已成为支持华南敌后战场一支最坚强的力量。”到抗战胜利前，东江纵队发展到1万人以上，整个华

南抗日纵队达3万人。

1942年2月，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为主任，委员有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主张应始终坚持人民武装面目。10月，尹林平向中央提出是否公开游击队红色面目的问题。当时正值南委、粤北省委事件之后，广东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认为，东江游击队公开面目的条件还不具备。1942年11月8日，周恩来复电尹林平：“你们对外应以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不仅在谈判如此，对群众也应如此。”

制，但共产党也抗击了一部分。9月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部、政治部决定向全队公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9月20日，周恩来电复尹林平批准成立东江纵队，“纵队可以发表宣言，而且应该强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

11月1日，尹林平领衔发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指示信，根据中央指示，以纵队名义对外发表、公布接受党的领导。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惠阳县（今属深圳市大鹏新区）土洋村根据地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纵队及其领导机关司令部、政治部，一般称为“东江纵队”。尹林平兼任政治委员，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1944年1月1日，曾生、尹林平等人发表就职通电：“本队同人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正确主张，为救国救民之唯一道路，故特诚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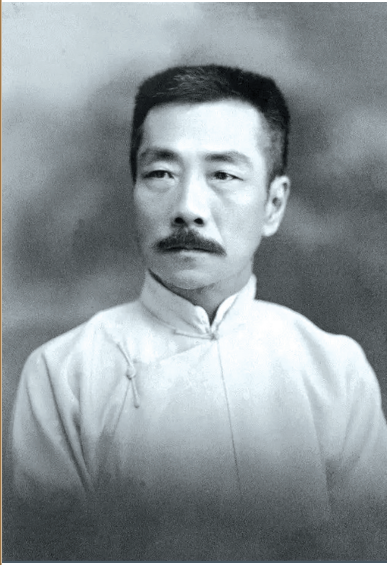
南抗日纵队达3万人。

党中央高度认可东江纵队的贡献。1944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中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945年8月，朱德在《命令冈村宁次投降》的电文中命令侵华日军，除被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向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其中，在广东的日军，应由日军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东江纵队改编是党中央与广东省委共同决策的结果。广东省委坚决执行党的决策部署并向中央建言献策，党中央充分掌握广东抗战形势变化作出正确决策，从而形成良性的央地互动。正因为如此，东江纵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据《学习时报》

鲁迅和郁达夫的友谊



鲁迅和郁达夫交往很久，二人从1928年6月起合编《奔流》月刊，共出版了15期。他们一边编辑，一边自己翻译，在《奔流》上刊登了大量译文。

鲁迅从日文转译了《苏俄的文艺政策》。郁达夫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卖国行径，翻译刊出了苏俄大作家屠格涅夫的一篇讲演，又在《译者的话》中直言：“日本人和中国的军阀通了气脉，打进了山东，惨杀了我们的几千万同胞，

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许多我国的法利赛人还在喊革命文学，想打堂克蓄德的耳光。”鲁迅和郁达夫并肩作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勾结，残害中国同胞的滔天罪行。

鲁迅和郁达夫互相鼓舞、相互支持。鲁迅对郁达夫翻译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作了高度评价，他在《奔流》第七期末尾“编校后记”中说：“首先当然要推的‘回忆杂记’，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

鲁迅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在《奔流》担负了较多的编辑事务。郁达夫在1938年《回忆鲁迅》中赞道：“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才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不得不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在《奔流》与读者见面3个月之后，1928年9月20日，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问世，鲁迅大力支持，在百忙中每期都送译文去，郁达夫对鲁迅的来稿处理得十分及时。

1930年2月15日，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彭康、冯雪峰等51人列名，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当时鲁迅致友人书中说：“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郁达夫）。”郁达夫也说：“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连做了几任的干部。”1932年7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郁达夫等就牛兰夫妇被捕一事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此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在这些活动中，郁达夫始终跟鲁迅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

颜士州 据《人民政协报》

即席诗人赵朴初

赵朴初的诗才，自幼便展露锋芒。7岁时，他翻乱父亲书房书籍，母亲随口嗔怪“七零八落”，他脱口对出“九死一生”，对仗工整、灵气尽显，乡邻皆赞其“神童”。这份天赋伴随一生，无论宴集出游、题赠应答，他总能不假思索、当场成篇，无需草稿，片刻成章，被赞“文不加点，倚马可待”。

1994年，87岁的赵朴初与众人同游海南亚龙湾，碧海白沙、鸿雁翩飞，大家围着他合影，笑说：“您当背景别动。”他闻言微微一笑，随口吟出：“踏沙晨作亚龙游，鸿爪倘能留？”当晚，他意犹未尽，又填《诉衷情》一阙：“不须逐鹿，山也回头，海也回头。”次日便传遍文坛，成为亚龙湾的文化名片。

他的即席诗，不仅有清雅文采，更有崇文重教、心怀家国的初心。作为民进先贤，他一生心系教育，抗战时期创办“上海少年村”，收容教育3000多名难童，用慈悲与担当为孩子撑起一片天。1979年全国班主任交流会议上，他即席写下《金缕曲》致敬教师，字句间满含对教育的赤诚，让无数教师热泪盈眶。

生活中的赵朴初，节俭清廉、温润谦和，即席诗中亦见通透胸襟。87岁散步时不慎跌倒，无伤无碍，他当场吟道“庭前跌倒又何妨，奋身起看满天霞”，老当益壮、乐观豁达，尽显禅者风骨。挚友启功赠近照，他即席题诗“老翁真个似童儿，爱物藏欢自怡怡”，鲜活地勾勒出友人的天真性情，传为艺坛佳话。

孔艳君 据《人民政协报》